

黑夜的奴仆

师范学院  
黑夜的双仆

藏书

[法] 米歇尔·奥斯特 著  
徐家顺 戴明沛 译

北京出版社

MICHEL HOST  
VALET DE NUIT

Aux Editions Grasset et Fasquelle

(根据格拉塞法兹格勒 出版社出版)

黑夜的奴仆

Heiye de Nupu

[法]米歇尔·奥斯特著

徐家顺 戴明沛 译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广益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625张印 164,000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200-00468-5/I·89

定价:3.10元 印数 1-3,520

## 第一章

塞纳河军浊的黄水裹挟着两岸的破碎物品、枯枝败叶滚滚流去。最近几年，城市上游建成的河道整治工程还不足以改变河水的流速。那些工程只不过使河水的流速平缓了一些，汛期里，河水淹没了阿尔马桥身上<sup>①</sup>朱阿夫兵<sup>①</sup>的脚、膝盖、胸、下巴和小圆帽。市政建设部门的人员站在齐腿肚子深的水里紧急疏导左岸滨河路上阻塞的车辆。右岸早已改建成高速公路。人们忙着牵引被人抛弃的汽车，或被漫不经心的主人随处停放的汽车。看热闹的人靠在桥栏杆上出神地看那些人辛苦地干活。

十月的夜晚。转瞬就是十一月的夜晚。塞纳河入梦了。我的思想和它结成一体。它由东向西流过城市。一些支流注入塞纳河，使它变成一条大河。那些支流本来可以把它们的名字加给它的。还是塞纳河占上风了。它为什么占上风？上帝的旨意。塞纳河一直很谦逊。它不如奥里诺科河，也不如亚马逊河。它从贝西尔门流入巴黎，奇怪地从黎明门流出巴黎。它在那儿绕了一个相当完美的弧形、一个令人放心的、母性的弧形。我们房屋窗外就是它的码头；在寂静的夜里，我听见河水哗哗地流淌。

---

<sup>①</sup> 桥拱上的雕像，身着轻步兵军服，巴黎市民习惯用它说明水位的高度。  
——译者注

我十分熟悉石头堤岸中间、一个接一个桥拱下面流着，塞纳河。我想谈谈我和它之间的亲密关系。塞纳河对人没有兴趣，但是人们却为它建造了白垩和钢的摇篮，一座座束腰的桥。人们为它写了书、画了画：文字的丰碑，忧伤的巴黎圣母院，激动人心的圣·夏佩尔教堂，还有一些阿摩耳雕像<sup>①</sup>的卢浮宫。德扎尔桥的桥面受到河水浸蚀岌岌可危，人们把桥面修复了。同样的路面，同样的栏杆。人们仅仅提高了桥拱的跨度，以便拆除那个碍事的桥墩。笨重的船只常常撞在上面。

我和它秘密约会的地点不是新桥，也不在维尔·加兰花园广场。晨曦初露的时候，那儿聚集着三五成群的人，有尖膝盖的丑姑娘，弹吉他的人和摄影爱好者。我在两个确定的地方等它。我在那儿从不同的角度、按我的方式看它。

我和它约会的第一个地点是在阿尔赛纳站前方，列车到达拉佩滨河路的地方。列车停稳之前向左优美地转一个弯，绕过法医学院那幢几乎不透光的大楼。那时我看见法医学院淡紫色的砖墙从我右边掠过。需要扬起头才能看见镶着厚玻璃、只能透进去一点光线的窗子。日落之前，大楼里亮着摇曳不定的玻璃闪光。不管白天还是夜晚，那光总是亮着。地铁列车停下来时，我禁不住想像那些躺在肮脏的墙后面的身体。他们在滚动的冷冻槽里等待着未必会是友好或爱怜的目光，警察局的检查，法医或医科学生的手术刀，殡仪馆员用手熟练地整理。地铁列车眶眶唧唧地开动起来；别的线路都改为高架线路、橡胶轮胎，听不见这种响声了。列车以正常速度向奥尔良——奥斯特里茨车站行驶，穿过奥斯特里茨桥。

<sup>①</sup> 即爱神厄洛斯的雕像：一个长着翅膀、张弓搭箭的少年或儿童。——译者注

列车行驶到架空轨道上，车厢的声音骤然变了。我们进入塞纳河上空。我们飞越塞纳河。留在玻璃房子和甲醛气味里的可怜的兄弟离我们越来越远了。眼前出现明亮的河水，风在水面吹起变化不定的、柔软的涟漪。讨厌、可怜死亡只不过是一个恶梦。灿烂、强大的生活在前进，在旧城及圣路易岛脚下缓慢地确立起来。地铁列车驶进奥斯特里茨站以前，我匆匆看一眼环绕教堂回廊的巨大撑架及苏里、图尔内尔、阿斯维塞三座桥。河对岸贝尔西方向露出里昂火车站，车站两边各有一座绿色变形玻璃塔。云彩会消失在里面。一列列载着沙子、煤炭的驳船在河上行驶。有时，驳船的甲板是封闭的，上面有一间舱房。一个船员在舱里用手握着星形舵柄。一个女人在船舱和船头中间的甲板上晾衣服，像农妇在地里晾衣服一样。水上船队沿普港口行驶，码头被风吹得干干净净，高楼的假窗户经日晒雨淋颜色发白。好像是在不时悄悄提醒注意对面阴郁的法学院。然后，列车重新驶入地下，眼前闪过暗绿色的墙，墙上渗出的模糊水渍和无尽无休的、飘忽不定的迪——迪波——迪波奈<sup>①</sup>。

地铁车站有许多优点。可以架设空中平台停车站。地铁车站好比城市书本的章节。它是各区的图案、栏目。要深入了解这座城市，恐怕没有比逐行逐字阅读地下“书本”的所有章节更好的办法哩？主从句，有时是独立句（一小段线路），插入句和派生词<sup>②</sup>；地铁的线路相互衔接，民族广场站（我从奥德翁剧院去那里，在夏特莱换车）、庇克布斯、拜莱尔、多美尼尔、杜戈米埃尔、站前路、斯瓦勒雷、民族

① 迪波奈是酒的广告，在地铁车厢里看墙上的广告是逐渐看清楚了的。

——译者注

② 指地铁线路。——译者注

路、意大利广场、哥维查尔、格拉西埃尔、登费尔·罗什卢、拉斯帕伊、埃德加·吉奈、蒙帕纳斯比恩芙努、巴斯德、赛弗尔·勒孔贝、拉莫特·比盖·格勒奈尔、杜普莱克斯、比·阿凯姆桥（我在这里下车）、帕西、特洛卡岱罗、波依西埃尔、克莱贝尔、戴高乐星形广场等站。民族广场——星形广场线横贯首都南半城。北半城有一条对应的线路，地下运行线路更深、不大和谐。我可以乘地铁到我和塞纳河约会的第二个地点。气候宜人的季节的约会地点。

格勒奈尔站是我最喜欢的车站。我穿过大桥向右边看，可以看见艾菲尔铁塔，好像只要一伸手就能摸着它；还可以看见玛尔斯战神广场附近一带地方，那石头光滑、草木葱郁的特罗卡岱罗山及山顶上的夏乐宫。阿尔伯尼街几乎见不着太阳。在这条通向豪华街区的狭长入口处，人们在两个水平面上通行：并不拥挤的车行道和相当于两岸建筑物三层楼高的架空线路。在帕西站以前，乘客用探究的目光透过双层帘子的间隙或者杜鹃花苍白的叶簇，竭力看那转瞬即逝或有损名誉的秘密。然而，地铁列车到站时，除了大白天亮着一个发黄的大纸板灯罩、一张矮桌子、几张笨重的齐本德尔式<sup>①</sup>扶手椅之外，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至于有生命的东西么，只有一个穿围裙的女仆拿抹布和喷雾器用力擦拭主人客厅油污的房门。

阿尔伯尼街口像门禁森严的大理石建筑的瑞士银行。也许我有点夸张。需要多加小心。您进去，切勿抱什么希望……从下面，在车行道上，架空线路左右两边供乘客进出帕西站的扶梯增加了恐怖的印象。

因此，乘客有种种理由放过前方这一站，走右岸肯尼迪

<sup>①</sup> 英国家具设计师。——译者注

总统大道（从前的帕西滨河路），然后走路易·布莱里奥滨河路和黎明滨河路。要消磨宝贵的时间，要无目的地逛马路，这段路是很适宜的。因为过了黎明门便什么也看不到了，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在阳光明媚的春天，这里撒满了阳光。冬天，这段路像坩埚似的盛接暗淡的阳光。因为这段路是东北向西南，它在寒冷季节和太阳在地平线轨道的移动方向几乎完全一致，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从温度和舒适的角度看，今天在巴黎几乎没有比这儿更好的地方了。这个看法似乎是小资产阶级怯懦思想的标志。小资产阶级和怯懦思想是共存的。我乐意承认我是这个阶级（有时，我打心眼里厌恶这个阶级）的一个极其特殊的成员。

乘客一进入右岸就有一种强烈的印象：除了塞纳河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看。林荫大道两旁是巍峨的楼房，瘦小的花园、尽人皆知的钱的秘密把它们和外界隔绝开来。本区的人，通常是女人带着不同种的大大小的狗，不知疲倦地挨着房屋和瘦弱的灌木边上一条狭窄的人行道上散步。这里找不到一家服饰商店，也找不着老式帽店，既没有咖啡馆，也没有隐蔽的酒吧。这里是这座城市中最像沙漠的地方。这正是这地方绚丽和无可比拟的魅力之所在。像在沙漠里一样，人们可以极目远眺，可以看见对岸安德烈·西特隆滨河路和格勒奈尔滨河路的美景，黄、蓝色摩天大厦、大饭店、办公楼的海市蜃楼。那仿佛是另一座城市的景象：紧张、忙碌、充满戏剧性、盖着纸板、修修补补，有巨大的起重机和轰鸣的拖拉机铁臂在运转，被低租金房屋切割得支离破碎，被建房热潮推动、塑化的，披着我们这个城市虚假豪华外衣的城市。这地方和时代的矛盾十分尖锐，只要迈进一步就能有所发现。滨河路上来来往往的几辆汽车似乎迷失方向了。



幸亏是单行线，才能径直朝市中心驶去。也许有一天，这几辆汽车会朝相反方向行驶，朝黎明滨河路外虚无的边界驶去。

那位行人朝西走。他沿着无精打采的河水向前走。上游还没有完全融化的雪把河水搅浑了。从勒阿弗尔，鲁昂飞来的海鸥……振动翅膀从一座桥飞到另一座桥。有时候，海鸥停在灰色的镜面上随波漂流，然后突然躲开双桨小艇或无舵手小船（运动员都穿着赛艇俱乐部的服装）。成群的绿头鸭挨着天鹅路——河中间狭长的绿色小岛——两边行进。浅黄褐色羽毛的母鸭、羽毛丰满的公鸭领着春天孵出的毛茸茸的小鸭（睁着惊奇的眼睛）顺流而下，向停靠在岸边的水上人家游去。有南方之星号、马提尼克号、土阿莫土号、斯匹次卑尔根号、布干维尔号……有人从船舱的窗子里把吃剩的早点扔给鸭子。鸭群从一户水上人家游到另一户水上人家，沿途乞讨吃剩的食品。一些孩子骑着自行车在码头上穿来穿去。一个只穿一条蓝色三角裤的年轻女人全身沐浴在早晨清新的阳光下。

人们只有在早晨静静地观赏这一幅幅田园风光。人们观察那些各具特色的驳船。一条船的客厅里陈设着桃花心木家具，和从前横渡大西洋客轮的豪华房间相比毫不逊色，只是小一些罢了（指长期行驶在勒阿弗尔——纽约线上的尚普兰号）。另一条船上有玻璃天棚，是一个水上花房：船上到处是常春藤、百日草、纸莎草。连甲板上也堆放着一桶桶栗树、一盆盆三色堇、旱金莲。可是船上一个人影也没有，花匠似乎不在船上。

另一条驳船形状像一个长长的废铁盒，一个空船壳。船身漆成血红色。舷窗是用焊枪在厚铁皮舱上开出来的，长满了铁锈。好像一条死船。可是仿佛随时会有工人带着木板和

落地灯来整修这条船。这条船的内壁上还留着从前装载过煤炭的污痕。阳光反射在舱壁上，映出横七竖八的、晃动的浅色条痕。一条通体发黑、肚皮发亮的肥雅罗鱼在红色船壳和河岸间的水面上游来游去。行人走近时才从容不迫地游开，沉入混浊的河水里。

在房屋高台和河岸人行道之间设有信筒；一个陡坡上有一片草地，长了锈的锚、破车胎；还有阶梯，刚刚刷过漆的跳板，以绳子当扶手的简易木板桥。外桥墩是一个水泥底座，整个冬天浸在水里。几根铰接的钢杆、直径很大的空心管子把每一条船拴在岸上的固定桩上。这样，船只不会互相碰撞。不论水位上升还是下降，船只可以随着水位自由升降。

河水的缓缓流淌，阳光对水面的抚摸，水栖鸟的迁徙，驳船，走路中看见人们或人们的活动足以在我心里触发机械时间向内在时间的转移。这内在时间是我的生命的节奏，是我的生命的搏动。有时，我在假期里和妈妈在中等山上和高山上旅行时有过这样的感觉，因为这确实是感觉，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孤独，山梁上的锐利山脊上刮着几乎听不见的风啸，云彩疾速或缓慢地飘过，积雪的山峰像在空中汹涌澎湃的波浪，使我恢复了我这个有生命的人的独特的搏动，也恢复了我这个年轻人、梦想家的搏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生活在远离喧嚣尘世的地方。塞纳河对我是不可缺少的忠实伙伴，萦回在我耳边的音乐，已经成为我愤世嫉俗的装饰。当我沿着它岸边行走，当我看着它时，我便重又获得受到威胁或失去的平衡。

可以说，我和妈妈再不离开我们在格朗·奥古斯丁滨河路的住所了。这正合我的心意。塞纳河在我窗外流过。我们最后一次假期同前几次假期一样，也是在山上度过的。妈

妈喜欢在山上度假，胜过在其他任何地方。我们去过采尔马特、卢加诺。我们熟悉费尔德基希，熟悉福拉尔贝格山脉望不到头的石级。最近，我们之间的关系亲密些了。不过我们在圣·莫里斯堡逗留的那些日子令人失望极了，妈妈打算去看看思加迪纳高山牧场。我们经济上十分宽裕，我也许再陪她去玩一次。说也是，我们一起在巴黎的住所度过了十个月，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再熬一个夏天。确实，在我的生活中除了妈妈，几乎没有人占据值得一提的位置。我父亲很久以前就不知去向了。妈妈的朋友托尼·索昂在他需要和对他有利的年代里像父亲那样待我。还有波拉·霍真。她是我两年前遇见的一个女人。她住在巴黎。我们尽量找时间会面。妈妈好不容易最近才同意接待她。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人了。

很多天以来，妈妈始终一言不发。她紧闭着嘴唇，从一张靠椅走到另一张靠椅，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她那发黄的脸色说明她缺乏睡眠。一到下午三点钟，所有的烟灰缸都盛满了烟头。波拉·霍真早就提醒我注意，连我的衣服上都有一股黑猫牌香烟的甜味。

最近这些日子，即使我的眼睛盯着妈妈时，我还是没有看见她。这使她十分恼怒，她开始盘问起来：

“你是打扑克输钱了，还是买赛马票输钱了？……”

“你知道我已经不赌钱了。”

“那么你是在谈恋爱。是那个姑娘吧？”

“是的，你说得对，是那个姑娘。”

“恋爱！我恋爱过吗？只要你有地位……波拉是一个可爱的姑娘，你知道我是这样看的。但是她却写起诗来了，

哼，今天谁还写诗呀？多么可笑！”

她的灰头发在走廊尽头飘动。她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了。她发火、撒气，我并不放在心上。我倒想起电影里的武士们，相互对骂好久才用纸板做的宝剑刺穿对手的身体。妈妈终于消气了，她从厨房或者从她卧室里出来，用比较平淡的口气提出新的要求，如：

“你没去过工厂吧。你应该去看看。托尼·索昂和我说过，是关于新机器的事。”

我回答说行。我不能违背托尼·索昂的意思，我说我会尽早去工厂的。

我知道她指的是美国制造的电子织布机的事。上星期货已经到了。看来真实情况是托尼·索昂在谈话中说过，如果我对新机器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厂里看看，他可以带我参观机器，不会有别的事情。她为什么禁不住添油加醋呢？

要是有一个观察家新近来到我和妈妈住的不好客的小天地，大概会对我们这种冷漠的母子关系感到诧异的。那是一种隐蔽、持续的战斗，一场争斗双方谁也不愿意首先发难的暗斗。她是出于对礼仪的尊重，不是因为爱我。我呢，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知道我有点神经过敏，容易冲动，控制不住自己的火暴性子。我发起火来就砸东西撒气。越是稀罕、贵重的物品，我越使劲砸、往墙上扔。就在前不久，我抄起一个心爱的瓶子——一件加莱<sup>①</sup>的料器，差一点砸伤看门人雷娜太太的孩子。几个孩子正在大楼的天井里玩游戏，玻璃瓶子落在他们脚边。瓶子是穿过玻璃窗落在院子里的。阴暗的

<sup>①</sup> 埃米尔加莱（1846—1904）法国著名设计家，所有他制作的料器和家具上都有他的签名。——译者注

天井里传来一阵可怕的喧闹声。雷娜太太的丈夫，一个矮小粗鲁的人，要去警察局告我。

这一切显得很遥远。我记得我小时候用水彩笔画冬天森林上的落日。当我一时找不着画笔、颜料盒时……马上就发起神经来在地上打滚。我大哭大叫直到筋疲力尽才肯罢休。后来有一次我发现我的抽屉被人翻过，我顺手抄起一把叉子对付妈妈。我曾经给一个女同学写过一首情诗。妈妈把那首诗搜走了，骂我坏蛋。事情几乎闹到流血的地步。我在气极了的时候，仿佛感觉撞在一堵墙上，同时又有一种冰冷愉快的感觉。我知道我这些怒气是怎么回事，一定是发怒能使我获得那种快感。最近几年这种发怒的情况明显地有所缓和。尽管我对素描、绘画的兴趣很快就淡薄了。至于诗，我一首也没有写过。

从大多数人理解的意义上说，我不认为我是一个正常的人。我懂得要是个艺术家，一个学者，某学科的创始人得了神经病，被看成疯子或怪人，他们可以用艺术和创作作为托词。于是他们的荒谬行为注入了合理的因素，让人放心了。对于我，从来找不到这样的托词。我任何东西也想象不出来。我的思想，我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的感情贫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欣赏一副画要耗尽我的脑力，这是何苦来呢？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莫过于听听音乐，从中得到一些乐趣。从我碰见波拉·霍真时起，我就以此自娱。谈恋爱，我还是可以的，妈妈不大理解：

“可怜的非立普，你在谈恋爱？你知道你的肚子开始大了吗？我不知道小波拉对你是怎么看的。”

前面谈到的那位观察家对我们母子二人的奇怪举止会揣摩不透的。这母子二人终于躲到荒凉的地方，摆脱一切物质束缚，保持沉默，捆住手脚无法解开那理不清的线团。我们从

来不能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是的，缄默不语是我们这所“修道院”的第一条规律。对一切事物保持缄默，有事无事皆缄默。原则的缄默，也许是自卫的缄默。妈妈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任何事。我从来不觉得有权利问她。一切都是我暗中打听出来的。

我快要到四十岁了。我在想比我大二十多岁的妈妈会有什么感受。她的生日是十二月三十一日，所以她是十足的年龄。她仍然爱打扮，她从来不随便放置她的身份证。不过有一天，她的身份证从手提包里掉出来，我看见过。我知道她确切的岁数是65岁，她只说60岁。她是在25岁时有的我。到了这个岁数，她还有什么东西好追求的呢？她姐姐早已嫁人，她大多数朋友大概也都成家了。当然，这一切和我无关，这不是我的事情。可以肯定的是，我只在妈妈肚子里呆了七个月就出世了。我是个早产儿。这不光彩的秘密一直严守着。据说，医生们费了很多气力才保住我的性命。这近乎于奇迹。我在暖箱里一直呆到我的生命完全没有问题的时侯。从几张我还记得的照片来看，那时候妈妈好像很爱我。

战争结束前，我父亲以英雄的面貌离开我们时，一切都变糟了。用妈妈的话说：“他像扔粪土似的把我们扔掉了。”她还说他，“跺跺脚就走了。”她总是这样责备他。她也这样责备我，她用憎恨的目光瞪我，以发泄对他的怨恨。

那是我们生活中最可怕的一个时期，比战争时期还可怕。她老是想死，我设法拦阻她。我们只吃到发霉的面包。然而已经用不着定量配给券了。面包房、食品店重新开始充分供应食物。她连酒也不喝了。她步履艰难，走不到自来水龙头跟前。我给她端去一杯杯水，她呷一小口歇一会儿。我又从她手里接过杯子。

那是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巴黎街头，人们砰砰地射击。圣·米歇尔滨河路码头和警察局之间射击声持续不断。有一些人举起双手从我们阳台下面走过。另一些人大概要洗雪五年的卑躬屈节和默默的通敌行为，唱着马赛曲游行。每条街上都有人唱歌。那时正是八月酷暑。天热得可怕，宇宙在膨胀。然而我们房间里阴暗、冰冷。妈妈还希望他会回来。她一直等着他。家里人不许我探头朝街上看，怕我中流弹。盖世太保仍然统治着人们的大脑，还有法奸，德军司令部的命令，第五纵队……总而言之，有数不清的理由禁止我走出大门。谢天谢地，我们有时能收到巴黎竞赛画报。我在这些杂志的照片上看见成堆的尸体和残肢断臂，所以明白情况远比我从客厅窗户隐约看见大街上的闹剧糟糕得多。巴黎解放后，家里人出于我说不清楚的某种害怕心理，仍然把我关在屋里。因为学校早就开学复课，我要跟不上班了。家里人请来一位绿眼睛女士贝尔丹小姐，她每天到我家来。她的任务是教我基础知识。她和蔼可亲极了。她除了教我读书、写字、演算之外，还教我用圆规画球、勾勒水仙花的精美轮廓，在花瓣上涂颜色。

英雄并不是突然间消失的。最艰苦的时期，即巷战之前的那些漫长、阴郁的日子里，他通常一走就是几个星期才回家。妈妈常对我说：“他走了半个月了，下星期我们又能见着他了。”她很少有估计错误的时候。他从来不空着手回家。他给我们带回来黄油、蒜肠。很久以来，这些食品再没有从前那样的味道了。食品的味道一定和缺乏食品的恐慌有某种联系。妈妈估计落空的时候，我们只好等待。我们的食品橱空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肯定不会挨饿的，因为他安排好了，有陌生人给我们送食品来，足够我们吃到他回家。我们知道他始终关心我们。我们十分放心。他按照通常可以接受的

方式在暗中战斗。他在我们家庭里留下的空缺并不很显眼。他是我们头顶上的房梁。勒克莱尔师<sup>①</sup>和美军开进巴黎之前一个星期，他派人来告诉我们他永远不回来了。我们艰难的生活仿佛又遭到雷击。他果真再没有回过家。几个月里，他只给家里寄回几封长信。妈妈读信时泣不成声。他在信里给妈妈写了些什么话呢？那些信找不着了。我不问她，这事不便打听。

今天是星期六早上，妈妈还在她房里睡觉。我知道她没有拉起窗帘。我想象得出她睁着眼睛躺在昏暗之中的样子。昨天晚上托尼·索昂来家里作客。因为诸圣瞻礼节的关系，妈妈提前二十四小时请他一起小酌。托尼·索昂要到旺代什么地方去探望他年迈的母亲，要到他父亲安息的墓地蓝花岗石碑前献三株大丽菊。当然，他既不信神，也不信鬼。实际上，他在为他自己准备后路。他要回到故乡去退休。这是他应该得到的退休，他不愿给别人留下话柄。他讨好教士，捐助慈善事业。他渐渐变成了一个显要人物。在这儿巴黎人中间，他很不显眼。在他家乡，人们会把他看成一个正直、公道的人，一个有成就的人。对他来说，这倒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这坏蛋靠阿歇尔工厂才得到这一切。他靠妈妈和我过着优裕的生活。

我对托尼·索昂是不公平的。他是我们家庭故事的一个组成部分。父亲离开我们时，把维尔纳夫勒罗瓦工厂留给妈妈了。我们厂过去、现在一直生产领带。收入足以维持生活。在战后两年中，我们的生活过得还很富裕。我们厂大批量生产三色领带，销路很广。妈妈曾经试图亲自管理阿歇尔

<sup>①</sup> 勒克莱尔（1902—1947）法国将军、战斗英雄，1944.8.26日随戴高乐胜利进入巴黎。——译者注



工厂。但当她因为悲伤过度身体受到损害时，便无力挑这个担子了。这时爸爸给我们派来一个得力的助手，就是托尼·索昂。“一个精通业务，值得信赖的年轻人，”这是爸爸写给妈妈的话。

爸爸没有看错人。托尼·索昂确实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他先帮我们巧妙地摆脱了税务部门的纠缠。因为，妈妈奇特的帐目引来多种捐税稽查员，就像糖招苍蝇一样。其次，我应该承认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商人。多亏他，阿歇尔工厂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我们向好几个阿拉伯酋长国、四个英国团体供应领带、衬衣、饰带及各色花边。总而言之，托尼·索昂已经成为我们不可缺少的帮手。

我并不是一直对托尼·索昂怀有敌意的。由于客观情况需要，他到我们家里时，大家都说他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他合乎时代标准。他高高的个儿（这一条标准什么时代都适用），褐色头发，稍胖一点。他脸庞宽厚，但是还算不上臃肿。他在街上走路时，女人都转身看他。她们平静、天真、随便地转身看他，也许她们感到惊奇，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竟然胖得不成比例。那时候人们吃得很差，身体强壮的任何迹象都表明物质生活丰富，女人对此特别敏感。除此以外，他善于与人周旋、沉着坚定。他的自信、辩才使我折服。因为，除了在冲动的时候，我实际上是一个腼腆、谨慎的孩子。妈妈出外看病或治牙的时候，总是把我托付给托尼照管。他带我去维尔纳夫工场，那时候还不叫工厂。他常带着我穿过卢森堡公园。我们走到离大水池最近的售货亭时，他常给我买一样小礼物：一个赛璐璐小风车，一架小飞机，一个泡沫橡皮球。他和那女商贩说话时，她眼睛发亮。这种掩饰不住的赞赏之情使我有他陪伴感到快活、自豪。说实